

《经济与文化》第一辑

大浪潮

胡伟希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经济与文化》第一辑

大 浪 潮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北京

(京) 新登字1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与文化 第一辑：大浪潮 /胡伟希主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9

ISBN 7 80092 258-8

I. 经… II. 胡… III. 经济-关系-文化-研究 IV. F-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9551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邮政编码：100009

北京市房山区东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开 9.5印张 2 插页 23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2.50 元

《经济与文化》总序

近些年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与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热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出现了空前的巨变。人们发现：经济改革的启动，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引起的，在盼望经济成长的背后，还有一种追求成功与创造的愿望；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冲突的困扰；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改革，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目前正在对行经济改革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现代化模式，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不同，而这些不同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当今成功的企业家，无不在经营管理之道中容纳愈来愈多的文化内容，并且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种时髦商品——文化，它不仅可以作为再生产的资源，也成为直接消费的对象；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今天，经济活动愈来愈多地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科技、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中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联系的中介无不是文化。总之，当人们对经济文化问题的重视，原因固然多端，但最基本的，还是由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思考以及人类在21世纪应如何生活的期望所引起的。如果说，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就具有了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的内容。

FJ54/20

本丛书的出版，即为满足思想文化界以及社会人士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和当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本丛书将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形式、分辑对社会上广泛关注的经济文化热点问题加以透视与评论。它包括：21世纪的经济与文化、中国经济改革纵横谈、亚太地区经济文化研究、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经济·社会·人（笔谈）、企业文化研究、管理哲学研究、特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台港社会与文化、区域经济与文化研究、特区经济文化之窗（动态、信息、报道）、海外经济文化信息（简讯）、自由谈，等等。

本丛书的宗旨是：立足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的建设，致力于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目标的实现，勇于探索经济改革与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与企业界作沟通工作和架设桥梁。

广大读者既是我们为之服务的“上帝”，亦是我们工作成绩的最终裁判官。我们热忱地希望本丛书能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并欢迎提出各种批评意见。

《经济与文化》编辑委员会

《经济与文化》编委会

主编 胡伟希

副主编 廖名春 何满宗

编委 张琢 刘志琴 吴廷嘉 辛旗

黄河涛 默明哲 谢宝笙 陈淑红

张添才 王勇云 尹飞舟 任平

林文军 翁美琪 麻天祥

责任编辑 张永

封面设计 李妍

版式设计 亘远

责任校对 刘桂民

目 录

《经济与文化》总序	(1)
冷战后东北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国际	
关系理论探讨	朱毓朝 (1)
中国民族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现代化	
吴廷嘉	(17)
传统与现代化：对中国历史研究中几个	
问题的质疑	高玉凌 (25)
论东西部关系以及西部开放与发展	
邹 蓝	(37)
2010年我国东、西两大地带及全国经济发展	
总量指标预测和定量分析	魏宏森等 (56)
论苏南乡镇企业与农村现代化之路	
张家東	(73)
延边科技、教育及发展战略构想	
魏宏森等	(81)
企业发展战略的优选法则初探	
王勇云	(101)
金融国际化的思考	
王书文	(110)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四通文化探源	
马明柱	(120)
构塑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的基本思路	
王成荣	(133)
论中国商业文化的历史氛围	
李瑞华	(147)
传统文化与乡镇企业的未来	
朱松寿 米险峰	(160)
家族文化与华人企业	
张 琛	(175)
日、美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黄河涛	(192)

香港经济成就与有趣的香港文化现象	谢宝笙	(209)
老子与企业管理	杨先举	(226)
广告共鸣点：文化的针对性	何满宗	(238)
文人要变成文化人，生产文化健力宝	雷桢孝	(249)
不平静的白桦林——在俄罗斯的工作与思考	锡 鹏	(252)
日本人与图书馆、博物馆——访日见闻之一	冯佐哲	(273)
《文化建设与经济起飞关系理论研讨会》纪要	方 瑞	(286)

冷战后东北亚的安全与经济 合作：国际关系理论探讨

加拿大皇后大学 朱毓朝

一、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随着冷战失去势头以至结束，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变化。亚洲、太平洋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继续繁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成果。而同时，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也正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最近，美国极力推动的西雅图亚太地区高峰会议也证实了这个新趋势，而这一趋势亦为该地区各国所公认，并且有意识地加以促进。但是，从全球范围来讲，其它许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遇到了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生态危机。这种发展与危机并存，进步与矛盾交织的情况正是人类面临的跨世纪的巨大挑战。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冷战和美苏对抗的结束，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以及两极世界的消失，给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各国安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种新的挑战同时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前。如果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问题的中心课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当前对南北双方都一样重要。当前的世界形势，一方面大的战争威胁（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代表）基本不存在了，但局部地区性冲突却没有消失。海湾战争、巴尔干前南斯拉夫内战

是极突出的例子。而非洲危机（如索马里）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持续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军事政变、反民主潮流等，更显示出冷战后人们并未面对一个更安全、更民主、更公平的世界。布什鼓吹的国际新秩序在海湾战争的余辉下一度很热门，现在也随着美在索马里、巴尔干陷入困境和整个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危机的无所事事失去了吸引力。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而动荡的世界。冷战时期在国际关系研究界起主导作用的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现实中受到了挑战。本文试图参照东北亚地区冷战后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发展，对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几种主要理论作一简要的评论。但不准备建立新的理论模式，只试图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①。

我们要涉及的东北亚地区，主要指的是中国（包括台湾）、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一直卷人在内的美国。这些参与者都有为自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安全需要。而当前根据这种需要所应制定的外交政策又都与各国在冷战时作出的安全承诺和防务安排有极大的不同。在目前的形势下，该地区各国的中心任务是相同的，那就是：如何在冷战后的条件下更好地协调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冷战时期那种基本上以国家安全为主要考虑而制定的政策，应让位于在冷战后新的基本无大的战争威胁情况下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为主要考虑的新政策。而东北亚地区目前的复杂情况也正是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方面，该

① 本文是在作者1993年提交给加拿大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年会的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因原文较长并且是英文的，作者对注释、参考书目和内容都做了删节和相应的改动。关于文中涉及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请参见国内有关评介文章和翻译，比如由袁明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地区包括经济发达的日本，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和台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国大陆，及目前尚不稳定的俄国远东和朝鲜等；而政治体制上各国的不同就更为明显了。这样，该地区各国不同的安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自关注与国家利益有关的重要问题，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更为突出。到目前为止，东北亚地区冷战后的安全安排没有成形，所以，承担这类任务的地区性组织也基本上不存在。冷战遗留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如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俄日北方领土争端等。但在经济合作方面，地区性区域经济合作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朝鲜、韩国、俄国、蒙古、日本参加的多国合作项目图门江开发区是一代表。中、韩、日之间贸易往来非常活跃。整个东北亚地区除朝鲜外基本上都致力于全速发展经济。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即使在冷战时期，东北亚也显然有别于欧洲的两极对峙、核威慑、军事集团和平行经济组织。东北亚实际上并未存在欧洲式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两极对抗。相反的，自从中苏关系恶化和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基本上结成松散的战略同盟对抗苏联的霸权。当然，两个超极大国的对抗仍极大影响了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目标和政策选择。朝鲜半岛的分裂就是冷战在东北亚的最极端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而且像幽灵一样在东北亚地区徘徊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亚在五、六十年代与欧洲政治安全格局相似。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东北亚一直没有一种协调机制以防止军事对立冲突竞争升级以至波及其他领域。这样，欧洲冷战时期存在的一系列如欧安会、裁军谈判、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定期会晤等形式的协调机制，在东北亚基本上不存在。但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军事关系仍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而非该地区各国所主动

促成的。总的说来，东北亚70年代后的安全形势形成与欧洲不同的冷战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冷战时代结束的冲击效果虽然存在，但大大不同于欧洲。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格局并未像欧洲那样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地区性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解决冷战遗留问题的条件有了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军事地位大大下降，朝鲜冷战时期的那种在中苏之间找平衡，并得到双方军事政治的支持与美韩军事合作对抗的条件也已不复存在。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经济合作和相互经贸关系，东北亚也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东北亚冷战时期不存在两个经济集团，即使日、韩与美加上台湾可算作一个经济团伙的话，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有限。各国有各自自己的发展战略，不过是经济互补性和政治的需要促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而朝鲜、中国和苏联也不存在双边贸易之外的经济合作与组织。目前，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存在。在发展经济学与发展政治学研究领域，东北亚的日本、韩国、朝鲜、中国都被称为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都具有相当的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而8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在不同性质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针促进了这种经济合作，而这种合作又进一步缓和了东北亚的安全形势。总的说来，东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的复杂多样性情况下取得经济发展、政治局势缓和的成就是很明显的。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在东北亚地区就不那么突出^①。

综上所述，独特的冷战遗产留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仍然

① 相形之下，东北亚地区并非没有危机，只不过危机没有如此严重。但人们仍可举出如中国1989年的危机和朝鲜核武器计划引起的国际反应。即便如此，中国仍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而朝鲜核问题亦正在得到解决。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转型也接近完成。

是不安的。冷战结束并未带来根本的力量平衡的变化（除了苏联解体削弱了俄罗斯的力量外），而冷战时期遗留的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也未得到全部解决。但与此同时，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代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区域经济合作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韩国政治民主化接近完成，同时经济进一步发展遇到新挑战；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也在1989年短期停滞后继续发展；朝鲜的经济困境与政治换代等问题尚待解决。这些均预示了地区发展的变数。

二、对四种比较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

前面我们简单分析了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下面我们将评介分析四种比较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其中，两种主要分析国家安全，两种主要分析经济合作和发展。

第一种是冷战时期在西方尤其是北美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又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①。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中，国家是最主要的角色，国家安全问题是第一重要的，由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结构因素，比如两极世界结构就比多极世界更有利和平与稳定，因而冷战时期核威胁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如麦什米尔的

①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渊远流长。重要的近代论著请参见Edward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Harper and Raw, 1946。现代最主要的代表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及他的名作《国家间的政治》。而一般人所称的新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和他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的强调国际政治结构影响的学说。请参见袁明主编的《跨世纪的挑战》中的有关文章，如迈尔斯·凯勒的评论和华尔兹自己的文章。

近作《回到未来——冷战后的安全》。^①他举出三个最主要的原因来解释冷战时期在欧洲的长期和平，其中包括两极化的力量平衡，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和核武器的作用。他再次确认了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即结构上的力量平衡有助于维持和平。他强调核武器威慑理论的作用，特别是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效果与相互毁灭效果。他总结说，在冷战时期，欧洲两极格局、两大军事集团力量平衡与核武器的存在，事实上保证了长时间的和平。对于冷战后的区域安全，他提出了如何恢复力量平衡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的建议。比如，他建议统一后的德国应拥有核武器，以此来建立新的力量平衡维持安全格局。他并且进一步提出，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比冷战时更脆弱。他特别提到极端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他的观点为前南斯拉夫的内战所证实）。总的说来，他的观点的基础是现实主义正统观点，其中包括：国际秩序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为国际政治的最主要参加者，而战争与和平（安全）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主要原因是不存在一个有主权的中央政府，因此，各国之间安全需要和利益冲突导致战争。他的论点十分接近华尔兹的著名论断^②，即坚持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多极世界格局中要大于在两极世界中，所以，他更倾向于冷战式僵局的力量平衡，并且预言，欧洲将要回到第一次大战前多极竞争的格局，而进入一个更不安定的危险时期。

①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Lones, ed.,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The MIT press, 1991.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1979.

因为他的观点是基于对欧洲冷战时期和后冷战的现实的分析上的，所以显然并不适用于东北亚。事实上，即使在欧洲，东西方对抗的观点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政治关系理论，都为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所挑战。那些主要理论依据，如反对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扩张，西方联盟的必要性和核武器的威胁力量的作用等，在两败俱伤的冷战后现实中均证明已失去意义。在东北亚局势中，无论是冷战时期或后冷战时期，政治军事安全格局都不同于欧洲。那种基本上相等的力量平衡并不存在^①，比如华约——北约式的军事集团。而核裁军谈判等协调手段也不存在。尽管如此，冷战时期的和平状态在朝鲜战争后基本上也保持了下来。而后冷战时代，朝鲜核武器的发展问题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关注。不管朝鲜核武器问题最后如何得到解决，在这里传统的核武器理论并不能解释问题的产生和发展^②。由此看来，这种新现实主义理论显然在东北亚安全形势分析上并不十分适用。

第二个重要理论主要是对所谓“第三世界安全”的研究和批评，其基本观点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两难困境。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是多样的，但也有共同的

① 请参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书中斯皮尔伯格的文章。

② 就连华尔兹自己关于核扩散的观点也不同于一般的反核扩散论点，请见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Adelphi Paper No. 71, 1981. 而朝鲜的核计划很难用主流派的核武器理论来解释，因为其核武器威慑作用非常有限，反而增加了其受到核攻击的可能。请参见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Macmillan press, 1981. 关于国际禁止核扩散条约，请参见 Joseph S. Nye, Jr., "NPT: The Logic of Inequality", in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85.

困境。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考虑到他们根本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他们必须自己平衡复杂的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与基本上被西方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所决定的国际环境的矛盾。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仅局限于冷战条件下的安全概念显然忽视了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来说，这种安全的概念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多角度的国家安全概念和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的地区的多种威胁都应考虑在内。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全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欧美思维框架内的，有很严重的缺陷。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军事冲突层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程式化的对国家利益做出解释的统治者对国外威胁的来源和能力的估计。但是，这种研究低估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结构、决策能力、经济技术不发达、种族宗教冲突以及人口和生态等更具威胁的内部问题。所以，真正的国家安全核心应与国家价值系统相联系。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反应，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安全问题的模式，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来决定”^①。

他们的分析研究也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所追求的国家安全的概念更广，它包括民族一国家的建设问题和在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安全(包括金融、货币、贸易、粮食的“安全”)。不结盟运动和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可看作是第三世界国家为追求广义的国家安全而做出的集体努力的代表。前者偏重于政治外交层面，后者偏重于经济层面。但是，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第三世界这种

① Edward E. Azar & Chung-in Moon, "Rethinking Third Worl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ir e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re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8, pp. 1-2 pp. 283-285.

努力的限制是明显的，因此，这两个运动都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或说各种正式非正式的规则、行为模式都是为欧美国家所决定的。因此，欧美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中起主导作用。换句话说，从军事层面、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的规则习惯、集团行为都为欧美所主导。在现存国际结构内，第三世界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努力都受到了根本的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评论者称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为“结构实力”国家，而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主要是结构上的不平等的原因所在^①。

另外一面，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是弱式的，不同于西方的强式的国家。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的基本稳定表明，来自内部的威胁对外部国家安全基本上是没有决定影响的；而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同，其大部分国内政治环境都不稳定，合法性强的政府很少，国家能力很弱。因此，对国家安全的外部保护诉求，争取的能力就很弱。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意义的安全概念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建设目标有根本的矛盾，这就造成了一种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和平与威胁观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内在冲突。而冷战时的国际体系结构实际上导致了国际、地区、甚至各国安全重要性的评判基本上为欧美大国，特别是美苏超级大国自己的政治考虑以及历史遗留的不公正的国际社会结构所决定^②。这样，整个冷战时期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观念

① For example,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② Aswini K. Ray, "A View from the Periphery", in Caroline Thomas & Pailiasothy Saravanamuttu,ed.,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South/North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